

# 第一章 汉语词义研究情况回顾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汉语词义研究的大致历程。这并不意味着本章内容是对汉语词义研究历史的完备记录。根据主要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把这一历程分为古代汉语词义研究和现代汉语词义研究两部分进行论述。

## 第一节 古代汉语词义研究简况

### 一、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词义研究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训诂担负着解读典籍语义的重任，使古代文化成果超越时空的局限，为人们所理解。从事训诂的学者，就是这样一群执着的“解语者”，以各自的解语主张，将关于语言意义的解说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薪火相传。训诂的功用本是它存在的原由，但恰恰也是这种功用掩盖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训诂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

回顾训诂学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由先秦训诂体式、训诂方法的初步形成和两汉训诂的成熟兴盛，到不法古人、标新立异的“宋学”，再到崇尚汉代学风、开创语源语义研究新境界的清代训诂学，直至着手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近代训诂学，训诂已经从一种单纯解说的行为方式逐渐积累成为把历代言语作品及其传注材料当作研究对象、并主动掌握自身学术走

向的独立学科——训诂学。由于训诂这一学术行为代表着解说经典文化著作的话语权，因而常常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与影响。尽管如此，训诂学最终还是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语言学意义上的重要分支学科。

近代训诂学家黄侃先生在《训诂述略》中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sup>①</sup>。按照这一界定，训诂学可谓集“小学”之大成于一身。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历代的训诂成果也不仅仅是一种注释，而是在注释的功用之外，又有了探讨“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学术意义。本文所论及的“中国传统训诂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即训诂学不仅包含训诂之事，而且包含训诂之理。训诂之事指“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学术行为本身，训诂之理则有两层含义：一是训诂所体现的原则、方法，二是从中发现的语言现象和规律。其实，训诂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在遵循语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由于训诂的实质是一种解释行为，在训诂理论、方法、体式等方面的研究中，始终渗透着对词义的思考。

### （一）训诂学对词义研究的启发

传统训诂学的范畴比语义学广泛，但训诂特别注重对词义的训释和研究，可以说词义研究一直是训诂学的中心课题。因此，在这门古老的学问与汉语词义研究之间，有着绝佳的契合点。

1. 历代训诂成果对汉语词义进行的历时罗列在今天具有珍贵的材料价值

从历时的角度看，训诂“接力式”的传承使我们得见词义

路广正《训诂学通论》第1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发展的大致脉络。如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力图讲解词的本义。后经南唐徐铉、徐锴兄弟刊定、注解，至有清一代，形成颇有声势的“说文学”或称“许学”。其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最具代表性。诸位学者虽各有偏重，但在对《说文》进行校勘、研究的同时，都对词的引申义进行了补充性的注解，其中不乏有关词义发展的创见。这些注解是我们研究词义发展演变规律的珍贵资料。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词典释义由古至今的排列，就是对历代训诂著作所记录的词义进行考察和整理的结果。这些释义为我们探讨汉语词义发展、各义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共时的角度看，各时代的训诂著作是当时词义发展情况的忠实记录，有助于对词义共时平面的研究。如果把各时代传注式和辞书式的训诂著作中的词义集中整理出来，并补充相应时代的用例，就接近于词义的共时平面语料库了。而对相邻时代的训诂著作进行比照，则能清晰地看到词义的变迁和发展。同时，训诂中反映出的词义在某个时代的发展情况往往透露着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相关因素的发展演变，这有利于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对词义进行探讨。

训诂成果既体现出当时时代的词义发展，同时又凝结着对此前词义发展情况的记录，是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研究词义的珍贵语料。

2. 训诂成果的学术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语料的层面，而且体现在理论层面上

(1) 训诂方法为今天的词义研究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训诂学中形训、音训、义训三种基本方法分别指向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个考察词义的角度。“形训”是指

以词的书写形式即汉字形体作为训诂的线索。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表意的方式或直观描画、或间接会意、或抽象表达、或标示义类，字形本身就透露出一定的意义信息，因而汉字形体对于考证早期词义和词义的引申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音训”指以词的读音作为训诂线索，有一部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语词在意义上存在相通之处，这种声义同源的情况可以部分地反映在文字上，有些形声字声符往往既标示词音又兼及表意，从而使同一声符参与造字所记录的词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利用语音线索探讨的词义多为词的语源义。“义训”则指不借助字形和语音而纯粹释义的训诂方法，比如可以用意义相近、相关的词进行释义，用类别名解释专名，也可以用今语解释古语等。

自训诂学发端直至近代国学，“形音义”始终是考证词义的三个重要因素，三者相贯通的研究方式也广为认可，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模式。

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曾这样阐释“形音义”在汉语研究中的作用：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发：

汉字字形、汉语词的声音、词义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

古今的观念是相对而言的，字形、语音的古今演变与词义的发展演变也具有相关性；

词义和声音的结合生成语言中的词，人们创造文字来记录这些词。即汉字所记录的是语言中的音义结合体，汉字的表意性使词义在造字时代成为造字的依据。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探讨汉语词义的两条线索：一是词义与字形；二是词义与词音。虽然在今天看来，汉语词义与字形的联系已经逐渐淡化甚至出现脱节，但从造字时代开始，这种形义间的联系就渗透进了汉语字词关系中。音义的联系就更为明显了，音是词的口头形式，是词义的直接承担者。在传统训诂学中凭借这条线索形成了“因声求义”“声近义通”的训诂原理，这对于追源溯流地探讨词义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前人所未能见到的新语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度过去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文字、音韵和词义研究的新成果，更好地探讨汉语词义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

(2) 随文释义、注重实证的训诂传统体现出对语境的充分重视

训诂的对象是言语作品中的词，这些词总是出现在实际语境中的。另外，训诂学家在注解中凡举一义，必辅之以实证。这就使训诂对于词义的讲解总是以具体语境为前提，注重语境变化在词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种语境包含着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上下文中具体的语义、语法及修辞要素。训诂对词义的注解是综合各种因素、进行整体求解的结果。用现代词汇学理论来衡量这种学术原则，可以说训诂十分重视词义的动态存在方式，在层出不穷的动态应用和变化中仔细考察静态词义的形成、巩固以及继续在动态中发展变化的过程。尽管随文释义使

得训诂成果看上去有些零散，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恰恰也是对词义具体变化发展的忠实记述。

### (3) 训诂著作中的理性思考对词义研究的启发

在一些训诂著作中可以见到著作者对词义发展的理论性思考，这些思考是埋藏在材料、例证中间的“亮点”，其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词义研究的重要课题。清代以后的训诂著作及训诂学专著中，理论性的阐述就更为丰富了，如清代学者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中就有大量关于词义引申的论述，反映出他对词义引申问题的深刻思考。

### 3. 训诂学带有浓厚的文化学色彩

传统训诂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问。在训诂注解中不仅有对词义本体的解说，而且有大量关于典章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有时几乎是在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考证一个词义。这是一种严谨的学风，同时也是词义研究的科学方法。词义本身身处语言系统中，与词汇发展、语法、修辞、文字等诸多要素都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词义作为人们认知成果、文化进程的体现者和见证者，与社会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等语言本体以外的许多因素也是相关的。清代学者把这种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虽难免有失于繁琐之嫌，但训诂的文化学倾向是值得肯定的。

## (二) 训诂学的局限

传统训诂学也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 1. 以字为词的传统观念

在训诂学中，没有与现代语言学中的“词”严格对应的概念。除了双声、叠韵等联绵词突破了一个汉字对应一个汉语词的模式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汉字和语言中的词相混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起初以单音词居多，单个汉字记录的

词往往就能承载完整的词义并参与句法构造，所以容易造成字与词的混同，再加上汉字形体本身和词义的密切联系，更使得汉字和词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从理论上对字和词加以区分。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表音文字记录词的声音，表意文字则以记录词的较早意义为主，也可以兼及表音。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形声字的增多，增添了部分表音的功能。正是由于汉字的表意性，才使研究者往往把汉字本身当作了语言中意义的承担者。事实上，文字是作为语言的书面表现形式而存在的，除了文字之外，语言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只包含语音和语义的口头语言形式。语言的这两种表现形式经过约定俗成之后，在视觉、听觉、意义理解三个方面达成了统一性，由此，字和词才建立了稳定的联系。

无可否认，汉语的词义在汉字形体上有一定程度的展现，但文字的表意性并不等于文字与词的混同。文字形体所传达的意义信息有时并不是词义本身，而是词义的某种形象化的表现方式。

在汉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汉字与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如汉字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大量异体字，多个汉字记录的其实是同一个词，这是文字孳乳超过词汇发展的情形；再如有着不同词义、且词义之间没有联系的两个词用同一个汉字来记录，这是文字孳乳滞后于词汇发展的表现，这种滞后源于简省的原则。语言符号及其书面符号系统形成之后，就是这样在不断调试中相携发展，调试以不影响交际、不引起歧义为原则，一旦违背了这个原则，文字就要执行准确记录词的职责，其中前一种情形需要通过异体字的规范约定出一个固定的字形来记录词，后一种情形则需要创造新的汉字与原来的汉字加

以区分，以便区分两个词。

传统训诂学基本上是以汉字作为语言单位来进行研究的，但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多音词的增加，以字为词已经难以适应汉语研究的要求。

## 2. 研究对象和范围局限于古代典籍

这就使训诂大多囿于书面语的研究领域，且经学致用曾一度成为它的终极目的，难以自觉地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去论述。

## 3. 关注材料胜过关注理论

积累材料是形成理论的必要前提，否则理论就只能是空头理论。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材料的堆砌，而乏于理论创见的话，对于一个独立的学科而言就是一种不足了。在训诂著作中，我们可以见到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零散阐述，但尚不足以支撑起学科理论的框架。

这些都阻碍了训诂学自身的学科建设以及它与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汉语词义研究进一步融合。

从传统训诂学中汲取有益于汉语词义研究的营养，让中国古老的学术焕发新的光彩，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将汉语词义研究推向深化、个性化，是近代以来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许多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熏陶的前辈学者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下论述是沿着学术发展的主要走向对近代以来的古代汉语词义研究状况所进行的大致归纳。

## 二、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的古汉语词义研究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力图保留和继承传统训诂学特色，同时努力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将训诂学建设为以古汉语词义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

章太炎先生是提出建立独立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第一人。1906年，他在《国粹学报》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期刊出题为《论语言文字之学》的文章，主张集文字、音韵、训诂于一身的传统“小学”应发展成为独立的“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并以《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开创语源学。同时提出以词义的探讨为出发点，进一步推动文字音韵之学，书面语和口语相结合来研究等一系列学术主张。这是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小学”向中国语言文字学蜕变的先声。“这标志着旧学的终结和新学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章氏‘语言文字学’三门类之一的‘训诂’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含义，即仅仅指词义训释。章氏通过他的《文始》和《新方言》等著作，将训诂学引入语源学和语义学的规道。”<sup>①</sup>这里把训诂仅仅看成是词义训释的观点显然难以涵盖传统训诂的全貌，但充分显示出了词义研究在训诂中的中心地位。

其后，黄侃先生着力于建构科学训诂学的学科体系，在《训诂学讲词》中提出对训诂学发展的如下构想：

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

材料：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

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

<sup>①</sup> 冯浩非《中国训诂学》第70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sup>①</sup>

在这个构想中，训诂学已经从单纯注释的功用性中解脱出来，并且明确了训诂学的研究重心在于词义。按照这一构想，训诂学将发展成为这样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以古代汉语词义为研究对象、继承传统训诂的注释传统、同时注重汉语词的书写形式、语音形式、词义三者的联系以及词义发展演变规律等课题的理论探讨。可以看出，这一框架与古汉语词义学基本相当。蓝图已经画出，黄侃先生的这个构想成为此后几代学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同时代致力于词源及音义研究的学者及其著作尚有刘师培《正名偶论》、《字义起于字音说》、马叙伦《说文解字疏证》、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沈兼士《广韵声系》、《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推阐》等。

这一时期的学术思路及其实践对已往训诂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

#### （一）沿用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范畴

在对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时，多限于古代汉语言语作品及其注疏。虽然学界提出了训诂实为“用语言解释语言”之学的界定，从理论上把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赋予它语言学意义上的理论界定，但在实际研究中，仍然多限于解释古语，还没有完全自觉地体现训诂的词义学价值。在进行训诂学学科建构时，也始终把古代典籍及其注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也使得训诂学的延续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sup>①</sup>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限制。

## （二）继承传统小学“形音义”相贯通的研究方法

深受传统训诂学影响的学者们继承并发展了“形音义”相贯通的理论，尤其在探讨词的音义关系上有突破性的进展。

章太炎先生作《文始》，根据《说文解字》中“初文”及“准初文”在字形、语音、词义方面的联系，考订音转义变之理，推求汉语语源体系。作为语源学的开山之作，《文始》虽难求全，但它“成功地突破了字形的束缚，从音义联系的观点上得到了成功”<sup>①</sup>，“不仅综合观察了训诂的汇通，也指出了训诂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方向”<sup>②</sup>。

黄侃先生论述由声音、训诂探求文字推演时说：“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始则分而析之，终则综而合之，于是小学发明已无余蕴，而其途径已广为康庄矣。”<sup>③</sup>在他留下的大量点校笺识中，有许多关于以音贯形义的精彩论述，收录在《黄侃论学杂著》、《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声韵未刊稿》等书中。

此外，还有几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也集中表现在由“形音义”推导语源的研究上。如沈兼士先生所著《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就是立足于“形音义”相贯通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取汉字声符，归纳音义联系，也就是透过汉字的构字部件，来看词义在字形中的模式化表现以及与语音的关联。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和《积微居小学述林》中也有通过汉语形声字声符音义关系探究语源的大量尝试。虚词研究方面，裴学海先生著有《古书虚字集释》（1932

① 王力《龙虫并雕文集》第一册第 32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陆宗达《训诂简论》第 115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③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 5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探讨了一些由同一语音形式演化出来的虚词，寻求它们的音义关系，多有创见。

这些研究大都是以形音义三者互相关联的方式来推演汉语词汇和汉字发展的源流。

此外，文字学领域涌现出一些与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论文。如张世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1923年）、陈钟凡《中国文字学上之原始宗教考》（1923年）、胡朴安《在说文解字中所得的人类学资料》（1928年）、丁兴广《文字学上中国古代货币勾沉》（1935年）等。这些研究着眼于对汉字进行文化考察，代表着新的研究思路，对后来词义研究的文化学倾向有启发作用。

传统学派虽以传统小学为根基，然而已经具备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高度和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理论探讨，并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实践，创见颇多，试举如下：

### （一）建构独立的汉语言文字学

在此之前，中国传统语言学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被冠以“小学”之名。尽管历代训诂学家的著述中也有许多具有语言学理论价值的见解，但都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撑，不足以形成专门之学。章太炎先生首倡建立研究语言文字的专门之学，可谓为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名之第一人。传统学派在继承旧学的基础上，把传统语言文字学建构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传统语言文字学从此成为来源于小学而又不同于小学的独立的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三者互相联系、有所区别，共同构成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整体。

### （二）开创语源学

词的音义结合最初是任意的，但语言符号一旦形成，音义

之间就有了相对固定的必然联系。汉字记录汉语的情况也是这样，什么样的字形或构字部件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成分也会形成某种模式。因此，语源学对字形、词音和词义关系的探讨对于汉语词义以及汉语词汇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这里开始，中国语言学真正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

语源研究对于词义研究有重要的启示。词义的深层义、同源词共有源义素的研究皆源于此。同时，对词源的探讨意味着超越汉字形体，摆脱字形束缚，真正从语言的角度，以语言中的词为本位去探求汉语词汇孳生、发展的规律。

因此，语源学创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分支学科的建立，还在于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汉语的字词关系。

### （三 在科学的语言文字观指导下建构训诂学学科体系

传统学派的学者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有着不同于前人的深刻认识，他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继承和审视旧学的。

章太炎先生认为“近世小学，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则未就语言之原”<sup>①</sup>；学问之道不但当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sup>②</sup>。可见他明确地认识到语言之学应以语言为本质对象，这一观点同传统小学更多地关注文字有所不同。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才能不拘于旧学，正确地看待汉语字词关系，由古音探索词义训诂，追寻汉语语源。

黄侃先生把训诂界定为“用语言解释语言”，以古汉语词义、词源为研究对象，这完全是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与清代小学有本质不同。黄侃先生的《训诂学讲词》标志着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这些从语言学的理论高度出发进行的学科建构工作对于传

李建国《中国训诂学史》第20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统训诂学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训诂学的学科发展以及它与现代语言学的进一步融合仍然是汉语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 （四）确立训诂学的研究中心是词义

黄侃先生正式提出了以词义研究为中心的训诂学学科框架，这是将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词义学引渡的开端。这个构想把训诂从小学“形音义”的整体中剥离出来，也使词义研究从以字为词的纠葛中独立出来，为训诂学与现代词义学的接轨作了预先的铺垫。

#### （五）认识到字形表面义与词义的联系与区别

黄侃先生在《训诂学讲词》中指出“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sup>①</sup>不同。所谓“说字之训诂”是指讲解汉字本身字面意义的训诂，这种字面意义与词义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等同于词义。也就是说，“说字之训诂”是专门就词义与词的书面形式——汉字的关系而言的。“解文之训诂”才是对具体语境中词义的解说。这样就把传统训诂中对汉字字形表意功能的解说和对词义的解说区分开来。

这是从语言学角度对字形表面义与词义的区别，也是对汉语字义和词义关系的初步思考。

另外，黄侃先生还提出“求源之训诂”<sup>②</sup>的说法，指从音义关系的角度探求语源的训诂。由此，他把传统小学“形音义”中“形义”和“音义”的相关性分别归纳为“说字之训诂”和“求源之训诂”，这种归纳是以词义为中心来进行的，

①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②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分别对应着词义与词的书面形式、词义与词的口头语音形式这两对关系。

#### （六）对词义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探讨

黄侃先生在建构训诂学框架时，除了总结训释方法、条例以外，还从训诂成果中提取出了关于词义特性及发展规律的理论要素。

如他所提出的“独立之训诂”和“隶属之训诂”<sup>①</sup>，前者指的是经过归纳总结的词义，后者则是指具体文献中的具体词义。在现代词义研究中，这是词义概括性和具体事物对应性的体现，同时也是静态词义与动态词义的不同存现方式。

这说明现代词义理论同样适用于训诂，反之，训诂成果也理应成为印证、补充词义理论的良好材料。

传统学派站在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的交界地带，试图用语言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过去的训诂学，同时又在为中国传统学术寻找着继续延伸、发展并创新的道路。作为先行者，他们已经望到一线曙光，摸索到一个方向，然而旧学蜕变为新学的过程毕竟是漫长的。

从本时期学者们的的主要著作和观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汉语字词关系仍然是困扰学界的理论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小学的“形音义”研究实际上是把字词作为一体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虽然理论上有了词义研究之说，语源研究也深刻地触及词义的深层，但词义尚未真正成为独立的主体课题。因此，仅从词义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汉语词义学从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传统训诂学的土壤中渐渐萌芽的阶段。

### 三、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古代汉语词义研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学者们把目光由深层词源问题转而投向更为具体的词义整理与研究。在继承故训的基础上，对训诂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扩展。中古与近代汉语词汇及词义被纳入研究范畴，材料选取也跳出了经学典籍的藩篱，开始重视更接近口语的俗语文学作品。

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词汇释》最具代表性。书中专门收录那些“非先秦两汉雅诂旧义所能赅，又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sup>①</sup>的语词，其中不乏中古、近古孳生的新词新义。这意味着中古、近古汉语词义研究的开端，也是训诂对象由书面文言词汇向口语词汇拓展的体现。

随后，蒋礼鸿先生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着重考证今人已难以理解的词义，取证翔实，并提出要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词义的发展演变。作者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说：“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sup>②</sup>；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sup>②</sup>。

同时，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仍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课题。

齐佩容先生在《训诂学概论》中正式提出“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的说法，并着重强调了词义研究是传统训诂学

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叙言”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的主导。齐先生还对“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意义的训诂”进行了区分，认为严格说来训诂学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的学科，而“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sup>①</sup>。

学者们还充分利用历代训诂成果，力求从前人的训诂实践中总结规律、方法。如殷孟伦先生在《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中详细论述《广雅疏证》中体现的词义研究方法，并评价说《广雅疏证》是“由散见的个别资料进而为集中的整理、分析，由时代不同的语言演变进而为古今的条贯的对比，由理论的正确指导进而为具体语言的证实，由繁复的语言现象进而为语言内部规律的探讨”<sup>②</sup>。

一些深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熏陶的学者，认为“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是在乎明经，后来范围扩大，也不过限于‘明古’。”<sup>③</sup>由此，传统训诂学被界定为一门偏重于实用的工具之学，难以胜任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重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努力建设不同于传统训诂学的“新训诂学”（或称为语义学或词汇学）。

新训诂学主张建立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语词义学，提出要有历史的观点、注重词义与语音、语法的关系、加强与文化史的联系、重视对词义系统的考察等观点。王力先生于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五十年代成书的《汉语史稿》中对“同类词”和“同源词”的探讨、关于汉语词义古今演变的论述等，都贯彻了新训诂学的理论主张。

齐佩容《训诂学概论》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第220至22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5。

王力《新训诂学》第320页，见《龙虫并雕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